

专题

◀ (上接 11 版)

每到一地，必取当地明信片记述作为家书寄回，可视同日记文献。这些珍贵的史料曾储之箧衍数十年，但未及整理。“内乱中，尽付劫灰。事后，目击者言之，殊深惋惜！”（《张元济书札跋》）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出版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了 1912 年至 1947 年间两位学人的 622 通书信，这些论书尺牍的整理工作正是在顾廷龙协助下进行的，书信中颇多记载有历史文献和出版印刷的史料和故事。其中由张元济捐赠并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傅氏原信和底稿曾请人抄录，这些抄件均经过顾廷龙的亲自校对。

1956 年，在迎接纪念张元济九十华诞之际，顾廷龙将张先生的序跋汇为一编，名为《涉园序跋集录》，之所以取“涉园”的名称，其中还有故事。原来张元济平时撰文、题识、通读以及书翰扇册，均只署“张元济”之名，但人们多以“菊生”的别号尊称之。古代和近代文人雅尚，多取别号、室名，而张元济并不喜欢这样的社交习俗。这样，顾廷龙在汇编张氏序跋时有些犯难，既不能违背张先生不喜别号的习俗，又不欲直呼其名，于是便冠以“涉园”之名。1985 年 7 月 30 日，我研究生毕业之际，顾廷龙先生曾将自己收藏的《涉园序跋集录》送给我并作了题签。此为顾廷龙生前的文献整理的工作之本，书前目录多有红笔和铅笔的打勾，多处书名处有“抽出”字样，正文中也或有校勘文字。

顾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论述了将散在各书并分隶卷末的 180 篇序跋汇集一编的编辑宗旨：“举凡先生校印群籍，早播士林，读者于所撰各书跋文，咸谓探赜索隐，启发攸资。徒以分隶卷末，检阅不易。因谋古典文学出版社辑为专集，以贻来者。”对于张元济序跋的学术价值，顾廷龙在后记中也给序了极高的评价：“先生既创建涵芬楼，广蒐善本，间复留意乡邦文献，及先世遗泽，专精毕力于丹黄楮墨间，积累蕴蓄，倾吐心得于题跋文辞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方诸前贤如义门、抱经、莞圃、千里辈无以过之。抑且访书南北，留珍海外，过眼琳琅，会神应手，允宜征引众说，阐幽发微，拾遗补阙，洞中要窍，此更前贤所未逮。”

《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是顾廷龙所撰写的论文中较为全面论述张元济在合众图书馆十四年间的重要贡献和事业历

程的文字，论文中以第一手的史料为人们展示了当年上海孤岛期间创办和管理合众图书馆的经过，并详细回顾了张元济在建国前后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中理书、印书、救书、捐书等种种事宜，是研究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最为权威的资料。

顾廷龙也曾有志向编纂张元济和叶景葵之年谱。1949 年春，胡适（1891—1962）曾到访合众图书馆，适逢张元济与叶景葵均在，胡氏曾力劝两先生撰著年谱，“两先生皆含胡应之，而龙不知揆量，即自告奋勇，谓胡先生曰：‘我能成之。’”（《张元济年谱序》）但不意叶景葵因患心脏病发于 1949 年 4 月突然去世，张元济在建国初赴京返沪后也中风卧床，当时、顾廷龙馆务鞅掌，编纂年谱之事便无暇顾及。后年谱由张树年编纂完成，1991 年由商务印书出版。年谱出版之际，顾廷龙在序中感概道：“先生年谱为龙有志所未逮，今得乐观厥成，欢喜之情，莫可名状。”20 年后，由张人凤、柳和城共同编写出版了《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 月），在前出年谱基础上增补考订；张人凤又汇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9 月—2010 年 11 月），其中第 1—3 卷为书信，第 4—5 卷为诗文，第 6—7 卷为日记，第 8—10 为古籍研究著作。全集中书信总数达到 4753 件，包括 1—3 卷的 4475 件，及截稿后又发现附于第 10 卷末的 278 件，为研究张元济提供了更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顾廷龙还曾具体指导审定了由王绍曾（1910—2007）撰写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 年 11 月）一书。早在 1980 年，王绍曾就曾撰写了《试论张元济先生对近代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的文章，1982 年商务建馆 85 周年时出版纪念册征集纪念文章。看到王绍曾的论文，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经研究，认为张元济尚无传记，因与顾廷龙商讨，是否在王绍曾论文的基础上扩写为传记，用以表彰菊老对近代出版事业及整理古籍之丰功伟绩，获得了顾廷龙的首肯。从 1982 年起，王绍曾即投入传记的写作，当执笔之初，顾廷龙即示意此书应着重阐述张元济对古籍整理之重要贡献。后王绍曾写作中每成一章初稿，即寄顾廷龙审阅，一经发现问题，顾廷龙即于原稿上随手修订，迄 1983 年全稿杀青，为时两年。当时顾廷龙正忙于《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定稿事宜，但对王绍曾寄送的稿件审阅，仍一丝不苟。1985 年 7 月 19 日顾廷龙致函王绍曾：“菊老平生学术文章，出版事业，得公椽笔，为之表彰，特别关于古籍整理一章，尤非吾公莫能道其详也。”王绍曾感叹道：“其实无先生，即无《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余感激之不暇，岂能反受先生之褒奖。”（《顾廷龙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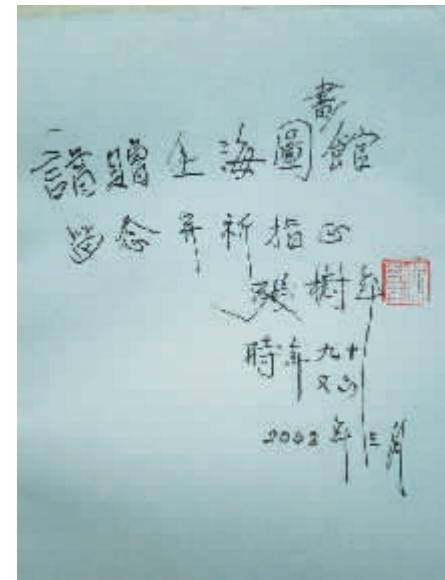
顾廷龙还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所出《张元济书札》（1981 年 6 月，1997 年 12 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 年 9 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 年 10 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 年 11 月）、《张元济诗文》（1986 年 10 月）《张元济年谱》（1991 年 12 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 年 9 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2004 年 1 月）题写了书名，使这些张元济的生前文献和研究著作显示出整齐划一、大气典雅的气象。顾廷龙不仅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其真草隶篆各体俱佳。王元化（1920—2008）曾对顾廷龙的书法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雅量之美，淳厚浑穆，神明内敛，气静机圆；书林中之诸葛亮、谢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柱之学、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才干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现，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年 8 月）

两位世纪老人在文化上的共同追求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张元济编印《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前，以校勘重印、继往存绝、方便学林为重；顾廷龙主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在后，以文献普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见长。张元济当



顾廷龙题签的部分张元济研究文献



张树年先生题赠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年谱》

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以及把握历史机遇意识给顾廷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廷龙认为：“先生之编印《四部丛刊》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两大巨制，断非常人所能成。先生尝谓龙曰：‘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十年，物力维艰，不能也。’赖其精心编校，遂成不刊之本。”（《张元济年谱序》）两位忘年之交也或有文献整理合作的项目，如《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前者顾廷龙承命为张元济作学术佐理，后者为张元济著，顾廷龙编。在合众图书馆的事业发展上，张元济注重宏观和管理着眼，致力于合众的创办、人才的引进、业务的指导、经费的落实、合众的捐献；而顾廷龙则注重从中观和微观着手，倾力于合众的运行、文献的征集、目录的编制、丛书的出版、读者的服务以及日常的主持，可谓各司所长、配合默契，灵犀相通。

顾廷龙当年在南下创办合众之前，就对张元济所编印的《续古逸丛书》及《四部丛刊》十分关注，认为这些丛书搜传善本甚夥，但也发现其中可以进一步过多善之处，如其中未能包括日本所藏宋本《集韵》，顾先生认为“独不及此，殊为憾事”。1936 年 12 月 3 日，顾廷龙在给叶景葵的信中建议：“《集韵》宋椠本国中

早失其传，诸家所校亦仅据影宋抄本，惟查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尚藏有淳熙刊本，异阙卷一，字大悦目，当称孤本。……先生如晤菊生先生，盍惠其访摄景本刊入《续古逸丛书》，早日公之同好，不其盛欤？”其实，《集韵》尚有更好的祖本。2000 年，常熟翁所藏六世藏书 80 种、542 册整体转让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中有《集韵》的南宋明州本，为众版之祖，也是翁氏藏书的核心之一，顾廷龙仅见过书影而未见原书。傅熹年在《常熟翁氏藏书图录》（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中对明州本作了如下的评价：明州本《集韵》“为此书传世最早刊本。清初为钱曾所藏，载入所撰《读书敏求记》中。约康雍之际进入怡新王府，同治初转归翁氏。自入怡府至今，近二百年中秘藏于王府、贵邸和海外，不为世知。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阮元、陈澧等只据其影抄本进行研究，即推重至，是在清代学术界有重名的孤本秘笈，也是清代通行诸本的祖本。”明州本重现于世，为《集韵》的详校与定本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基础。

2017 年适逢张元济 150 周年诞辰，谨以所阅所闻所思，略述他与顾廷龙先生之间的文化情谊，藉志后学的景仰之情。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